本书应该是讨论近代中国国家形成问题的最近一部综合性专著（2019），不过在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作者李怀印对该领域中，已有著名成果的继承，如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或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作者毋宁说是另辟蹊径，重新架设了一个分析的框架，在此之上叙述其关于现代中国形成的见解。

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地缘、财政和认同。地缘即地缘政治，不过作者的理解似乎并不偏重“地理”的一端，作者对此的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在的位置，以及在与他国争夺战略优势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几乎等同于国际关系学，不过在具体分析中我们还是能看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财政角度仍是传统的经济学问题，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如何使国家经济富足并有能力对其尽可能地提取，本书主要关心后者，即国家对经济的抽取能力。政治认同比较接近孔飞力书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建制议程”，但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作者在本书中广泛运用了比较的史学方法，先是否定了以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或是帝国的概念来描述清帝国的合理性，之后在正文的倒数第二章，结论之前，又将中国近代国家的转型与穆斯林帝国特别是奥斯曼土耳其相比较。对作者在比较中所得到的结论，笔者基本表示赞同。

1600年是本书不太准确的一个时间上限，其实主要的叙述从清代问鼎中原开始。这一部分作者所引用的资料最丰富，其分析也最有启发性。作者注意到了清朝作为中原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主要是和宋、明比较得出），突出体现在其边疆政策上。作者认为，清代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再定义或扩大了“华夏”的概念，不过这主要是就明代才形成的“汉地十八省”说的，在更长的历史跨度上看，并不准确。但清代的边疆关系确有一点是以前各代（除了元）所不具有，在乾隆时期清朝疆界基本稳定后，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没有边患的担忧。清代前中期的边疆政策几乎可以与俄罗斯相比较，都是为了核心地带的安全、自身防卫，而拓展国土。不过清代似乎要“成功”一些，体现在清朝的版图拓展到准噶尔之后，清廷已经自觉满足，边患不复（也确实如此），于是停下了扩张的步伐（乾隆拒绝哈萨克人贡献土地即为一例），俄罗斯却从未餍足于已有之国土。满汉关系的特殊张力也为作者所注意。

除了相对于传统汉人王朝的特殊性外，清帝国也有相对于欧洲帝国而言的特殊性，这又是中原王朝常见的特性，至少就明朝来说是如此。一是内部的同质性，仅有的人口大多数为汉人的帝国，同时拥有一致的文化；西欧近代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对税收的积极榨取是国家能力提升的一大原因，但清帝国却在长时间自愿保持着低水平的财政均衡，税收低的同时并不积极拓展税源、提高经济增速，这一点笔者特别想提及作者未曾分析的方面，即这种低税收的停滞态，是明清中国的特征，却不是汉到宋代中国的特征，其中例证之一即为北宋历次的改革，对税收的需求都是动力之一；在地缘政治上的特点也将清帝国与欧洲区别开来，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间地位平等，但清帝国却是东亚特殊的存在，享有“国际关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上的最优势地位。

到了晚清的中国，面临西方的挑战以及内部的忧患，清廷也开始着手进行改革。作者特别指出，帝国末期出现了显著的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地方化。虽然清帝国最终以清帝退位告终，但作者还是认为清朝的治理以及改革收获了一定的成绩，这主要体现在：国家政权的转移没有导致领土的分离，基本保持了原有的政治共同体架构；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上的变革为民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作者看来，清朝覆灭后中国无疑获得了最好的结局。

相较于本书对清朝的分析，民国到国民党落败退至台湾这一段的历史，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出彩，除了资料不够丰富外，作者的“地缘、财政、认同”分析法在这里似乎也遇到了瓶颈，不太能很好地囊括民国时期的复杂历史现象。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共产主义的分析缺少了全球化的视野，同时也未能充分注意到对历史造成巨大影响的偶然性因素。这里只稍微提及一下作者的一些观点。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思想之紊乱，不足以在共产主义的竞争下相对抗，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作为领导人的蒋介石对于思想缺乏掌控能力；二是中国最终走向高度集权的体制并不是一定或者最可能的（作者大概这样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最终走向民主宪政就是反例。

总的来说，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历史书写的一种模式，为“现代中国形成”这一宏大的课题增添上了新的砖瓦，可以自成一说，但还不是事实的全部。